贪官“二进宫”,谁在“开绿灯”?

出狱11年后,殷光立再度被逮捕。16年前,安徽阜南县委原书记殷光立因受贿罪获刑十年。服刑5年后获假释,假释期间进入安徽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系统,先后担任龙亢农场副场长、安徽农服副总经理等职务。因涉嫌受贿、私分国有资产等犯罪,殷光立今年7月被安徽检察机关批捕。

一个身负前科的贪官,居然能被重用,监管方面似乎也没怎么设防,结果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二进宫”。此事最大的看点恐怕不是贪官掌权后再贪,而是贪官出狱后摇身一变成为国企领导。究竟是哪些人因何因素将一个“前贪官”又推上了公权力位置,并为其继续贪腐创造条件?

10年徒刑5年结束,腐败分子有没有改造好?这首先就存疑。被法院判处刑罚的人员按规定应是开除了公职,可殷光立假释后即被安排到国企,并担任领导,这更是个传奇。这种人事安排显然是严重违规的。此时,殷光立的身份是获假释的服刑人员,并不同于刑满释放人员。而即便刑满释放人员,甚至正常职工、干部,也要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才能逐级走上领导岗位;一个假释贪官却能“平步青云”,这不得不令人怀疑:不会是当地有关方面按照殷光立原来的职务、级别在安排工作吧?某些领导难道根本就没把他当成罪犯?

贪官“二进宫”,这出闹剧背后是否存在违规假释、违规人事安排等问题,有关方面该给个说法。闹剧的主角自当处罚,而让主角上台的“导演”也必然难辞其咎。

(据《新京报》)

“崇洋媚外”拍合照折射时代焦虑

“7日下午,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帖称:4个‘精日’身穿二战日军制服,乘夜在著名抗日遗址、爱国教育基地四行仓库拍照留念,恶毒亵渎烈士英灵,令人发指,求扩散!微博甫一发出,立即引起了大家的转发与热议。”

配图显示,4名男子身着日军的全套军服,在昏黄的灯光下,站在四行仓库门口合影,但他们的脸部都被打上了马赛克,难以辨认。而同时曝光的另一张文字截图显示出,他们觉得这次合拍相当刺激,因为他们只用了短短几秒就迅速搞定,且几乎没被人发现。无独有偶,就在这件事发的前一天,8月6日,两名中国游客因在德国国民议会大厦门口行纳粹礼而遭德国警方逮捕。

对于这两起事件主角们的做法,相信有良知的国人都是绝不会苟同的。但不得不承认,现在在国内确实存在着这样一批“精日”和“黄纳”分子,吹捧并盲目崇拜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中有些人纯粹就是为了追求好玩与刺激,认为既往这两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反人类举动特别酷,能够满足自身叛逆情绪的宣泄;还有一些深受日本动漫和欧美电影的影响,觉得他们很帅,在颜值面前,是非对错都可以忽略不计。但笔者认为,当代年轻人对历史知识的匮乏导致的爱国心丢失,才是这一现象的根源所在。

目前创造华语影坛最新票房纪录的电影《战狼2》正在火爆热映,相信看过的人都会油然生出一种“我是中国人”的自豪感;还有之前同样表现不俗的《湄公河行动》,满满的正能量与爱国情让观众们的心灵得到了涤荡。用电影的形式、偶像的力量召唤出观众的民族自豪感,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而国内这些“小团体”多年被反对却仍然存在,与我们有关部门的重视力度不够有很大关系,德国执法部门果断将这两位游客拘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是不是在我国,这些肆意伤害国人感情的行为,也应当受到更严厉和更果断的处罚呢?每一个有良知、爱国家的人都在拭目以待。

(据《解放日报》)

有一种“黄雀在后”叫保姆贪腐

被纪委从高铁站带走近一年半后,“救火书记”李亿龙被检方公诉。但就在李亿龙落马不到一个月,他们家的保姆胡兴红也被立案侦查。究其原因,胡兴红通过找李亿龙打招呼、批条子,帮人调动工作、找工作,前前后后敛财20万元。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其大意指:只顾眼前利益,不顾身后祸患的人。本是对鼠目寸光、利令智昏、不顾后患这类人提出警告。也比喻有人一心想暗算别人,却没想到有人也想暗算他。在这现实版“救火书记”家的保姆贪腐,或许对“黄雀在后”有了另一种诠释。被纪委带走的当天,某市长为送别李亿龙,上门送了5万块钱,却被保姆从中抽走了2万元。胆够大是毋庸置疑。但缘何一个保姆能够心存“上山打猎,见者有份”着实值得令人嘘唏不已。“黄雀在后”式的保姆贪腐尴尬了谁?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事实上,保姆或是秘书、司机贪腐并没有多少新意可言,其本质仍然是权力滥用和腐败,只是有“大树”撑门面而已。纵观李亿龙所作所为,2006年至2016年,违规收受党员干部所送礼金共计人民币153.79万元、美元5.9万元、欧元3000元;用公款报销其购买的名牌手表、眼镜等高档物品费用,用公款支付聘请保姆的相关费用及生活开销;在已配备一辆公务用车的情况下,将原工作地一辆越野车带到衡阳使用等。试想,作为领导的自己都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又怎么可能不潜移默化家中保姆?

“近水楼台”。再进一步说,作为一名保姆自身并没有权力,之所以能够前前后后敛财20万大肆贪污,只是“借用”了领导的权力罢了。更准确地说,保姆腐败只是钻了领导腐败的空子。从报道中可知,如果没有十八大以来,李亿龙多次超标准乘坐交通工具,其中7次乘坐飞机头等舱,17次乘坐高铁商务座,12次乘坐高铁特等座;没有违规占用总面积374平方米的两套公用住房,并长期占用衡阳某酒店一间豪华套间等等如是的权力任性,保姆就没有空子可钻。就没有通过找李亿龙打招呼、批条子,帮人调动工作、找工作事实成立。就不会“近墨者黑”进而胆大妄为。

缺乏约束的权力,就会有让人瞠目的腐败,这是不争事实。借用权力的大旗贪腐,保姆身陷囹圄咎由自取。可这块“板子”绝不能只打在李亿龙和其保姆的“屁股”上。得捋一捋,让领导干部自身清正廉洁、一尘不染是谁的责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杜绝“身边人”的幻想,不给其以可乘之机该谁负责?该如何看管好领导手中的权力,形成完善透明的权力监督机制,斩断权力对身边人利益输送的管道?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再看“黄雀在后”式保姆贪腐,是笑话亦是警醒。这也再次考验着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是否有效、精准;对公权力的运行是否有及时、威严的纠错、追究、问责。这不仅是根治领导干部腐败的唯一路径,更是铲除保姆式腐败的保障,也才能从根源上杜绝腐败。

(据《北京青年报》)

芒刺

单位新招了几个清洁工,我没想到,爹是其中之一。您不好好歇着,怎么跑到我们单位当清洁工,也不想想自己都多大年纪了?爹一梗脖说:咋啦,我没走你的关系吧,不违反规定吧,没说不招乡下人吧?他笑了。

我却没笑,笑不出来。爹看我这样,也收住笑,板起脸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人知道你是我儿子的。

自打娘去世,我就求他进城来住,那会儿他说啥也不来,非要守着一亩三分地。前段时间他主动提出要来,说以后就在城里长住。

爹一来就给我上课,你在大企业做事,得守住自己,干干净净的。我听说,咱村的银柱前些天就因为受贿进去了。

我明白爹为啥挑这时候来,年后我刚提了副总经理,分管销售。您是来“看”我的吧?嗯,我就是来“看”你的。

从此,我每天如芒在背。那芒刺,就是父亲的眼睛。

一天下班回家,爹问:你这官到底有多大,出了办公楼,还有个年轻人专门替你提包、开车门?年纪轻轻的,该自己干的事自己干,摆什么官架子。我当然谨遵父命。

家里来了客人,提着礼品,如果不是亲戚朋友,爹一定会撵出去。我要在外面吃饭,必须事先和爹交代清楚:去哪个饭店,和谁一起,因为啥事。爹管这叫备案。

有一回,我晚上在外面吃饭,忘了备案。回到家时,爹在客厅沙发上歪着,鼾声如雷。我想偷偷溜过去,没走两步爹就醒了,两眼冒火地看过来,接着就是一顿批。

爹还是个情报员,从各方面搜集了单位职工对我的看法,赞许他一般不提,只跟我说负面意见。什么我对职工太苛刻啊,有时只做表面文章啊,等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爹训示时,我只能规规矩矩地听着,心里叫苦不迭。

那天,警车呼叫着开进厂里,两个副总涉嫌受贿被捕了。我突然觉得:家里那个倔老头,其实挺可爱。

(据《检察日报》)

中国接收难民之争

在去过中东地区的一些人眼中,那些随口支持中国接收难民的声音,过分拔高了人道主义的美德,而低估了现实中叙利亚问题或中东穆斯林问题的复杂性。

近些年来,由于缅甸北部时常发生武装冲突,导致缅甸民众到中国境内避难。图为2015年时一些难民在中缅边境的云南临沧南伞镇的集中安置点

■ 王衍

远处飞机的隆隆声迫近,还没等人抬头,几颗炸弹就在周围落地。一声巨响后,原本那些熟悉的街道和建筑瞬间化作断壁残垣。当幸存者从漫天尘土中清醒过来,四周仅剩下残缺不全的尸体。

在中东的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这一幕成为不少人难以磨灭的回忆。每次空袭或地面交火,留下的除了生灵涂炭,便是民不聊生。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统计,正在交火中的叙利亚已有500万人丧生、1100万人沦为难民,全球则共有6560万难民,他们四处逃亡,寻找生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攀升。

6月下旬,世界难民日前后,一颗“炸弹”在中国互联网上炸开了锅——“中国要接收中东难民?”相比欧洲国家,那些流离失所的中东难民对中国公众来说,更多仅存在于新闻画面中。但近几年来,这类话题不止一次激起民间强烈反弹。而随着中国在全球扮演起越来越多的领导角色,外界对其在难民议题上的“大国责任”期待值也在攀升,这将进一步考验中国的平衡术。

过分拔高人道主义?

“谁要支持中国接收中东难民,谁自己先去中东!”因公务需要,余明明曾在2015年到访过伊拉克。尽管两年过去,一切历历在目:巴格达古城早就被战争蹂躏得只剩下残渣,街上能看见的男性,年老的深陷残疾,年轻的荷枪实弹,少见的妇女儿童都在乞讨。“走在街上,时不时就能听到街区枪响,如果没有保镖陪同,根本不敢只身前往。”

“已经停战这么多年的伊拉克都是如此,更不用说还在战争中的叙利亚了!”当余明明看到“中国接收难民”的字眼,急得恨不得跳起来。

在南苏丹执行过维和任务的何启凡,真切目睹过难民营的生活。“有个人在难民营外被割喉,过了几个小时,那人跟跄站起来,回到难民营中。”他回忆说,“有些人白天是难民,晚上就拿起枪,参加战斗去了。”在他的认知中,正是因为这样,南苏丹的内战才经久不停。

在他们眼中,那些随口支持中国接收难民的声音,过分拔高了人道主义的美德,而低估了现实中,叙利亚问题的复杂性。

这些复杂性早就在欧洲显现出来,多个欧洲国家在接收难民问题上表现出疲软,甚至深陷泥潭。那些2015年曾对难民慷慨开放的国家——德国、瑞典、丹麦等,早已转变态度,其国内社会也因难民问题变得分化。因为陆路受阻,与去年相比,今年同期经地中海从北非前往欧洲的难民数量明显增加。今年1月至5月底,德国境内新递交的难民申请为77148例,2016年全年难民申请数量为28万。

有着20年接收难民史的德国,曾在2015年短短一年接收了上百万难民(德国总人口8000万),安置、分配以及治安等问题成为主要挑战,并一度成为德国总理默克尔未来政途的争议点。据德国《时代周报》5月9日报道,在德国萨克森州弗莱贝格市,市政府工作人员90%的精力都要用来处理难民事务。这令市长克吕格尔不得不给默克尔写信,要求联邦政府支付70多万欧元难民融入方面的开支。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6月3日共同发布的《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17)》中也提到,国内层面,难民融入是德国社会未来的最大挑战,德国的反恐形势也依然严峻,右翼民粹势力在此背景下的上升也给德国政治生态带来了一个新变量。

相比德国,本就态度冷淡的法国、英国更是收紧政策并驱逐难民。2017年2月,寒冬里,巴黎和伦敦的警察不顾外界同情的声音,大张旗鼓地执行难民驱逐令,那些在街头搭建起帐篷的难民,其居住设施直接被警察拆除。

与此同时,难民潮所带来的恐怖主义隐患和文化融入问题,也冲击着高尚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在多个欧洲国家,一次又一次升级的恐袭轮番占领新闻头条。仅在今年3月,英国就发生了三起恐袭;去年7月法国国庆日期间,多地发生爆炸;更不用说2016年新年时科隆发生的强奸事件,都在人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遭遇一系列现实挑战后,欧洲多国对难民的接收和收入程序变得更为谨慎。民调显示,欧洲10个国家、55%的民众希望未来停止接收或减少难民。

如此背景下,中国这个在全球化问题上能和美国叫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推到了“接盘侠”的位置上。事实上,自欧洲高调接收难民开始,中国就不止一次被卷入类似讨论中。

中国回应:“难民不是移民”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触角向外延伸增多,范围变广,但在中东地区——这个大国必争的泥潭之地,中国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有限参与”。

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一直通过劝和促谈推动叙利亚问题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前进。截至目前,中国已向叙利亚及地区国家提供了总计约6.8亿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6月17日,正在叙利亚访问的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解晓岩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无论跟叙利亚政府、反对派,还是地区国家,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介入叙利亚问题的国家,我们都保持着接触,“这是中方在斡旋方面的优势”。

“让中国做中东难民的接盘侠,是不公平的。”何启凡对记者说,“如果真的要中国负起责任,应该先让美、俄以及欧洲国家停手,让中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中东政局和未来的设计中,然后(他们)才有理由把问题扔给中国!”

不过,关于中国角色和作用,联合国官员有着另一番解读。6月初,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访华时曾说了一番颇有意味的话。“联合国难民署非常重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进行合作,以应对全球难民问题。”他说,“‘一带一路’倡议突出包容性,提倡和平与繁荣,“更加和平繁荣的世界就意味着越来越少的难民”。看到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格兰迪认为,中国能使十几亿人走出贫穷,其经验和方法对世界有借鉴意义。此外,中国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向许多贫困国家提供支援,这也有助于解决难民问题。

此次难民话题发酵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6月26日给出了官方回应:“难民不是移民。在世界各地流离失所的难民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重建自己的家园。这既是每个难民内心的愿望,符合国际人道主义努力的方向,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决议的组成部分。”他还主张,解决中东难民问题,首先需要加快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帮助难民回归创造必要条件。这一回答,从一定程度上,平复了中国网民对中国接收难民问题的担忧。

记者此前在德国难民营采访期间,大多数来自叙利亚或其他中东国家的难民也曾表示,对他们来说,最理想的方案还是回到自己熟悉的祖国。而在现实中,难民的流向也与文化接近度有关。

据不完全统计,尽管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曾不顾生死地跑到欧洲北部的瑞典、丹麦等国,但巨大的文化和生活差异让其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不少人最终选择撤回到文化更为接近的土耳其居住。目前土耳其境内的难民数量约为330万。

同样来说,在文化层面,中东难民在中国也会遇到诸多现实挑战。另一方面,相比欧洲或北美移民国家,中国对难民的接收历史较短,接收人口也较少。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截至2014年8月,中国接收了约31万难民,其中绝大多数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接收的印支难民,即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难民。

1978~1982年,大约26万越南人、2500名老挝人和为数不多的柬埔寨人涌入中国。他们被中国政府集中安置到广西、广东和云南等地,大部分是华侨农场之类的地方。这些难民基本都有华人血统,除了部分人后来返回来源国,大多数人已获得中国身份,较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到如今,这些难民及他们的后代已近30万人。

不过,据联合国难民署网站介绍,这只是中国政府难民政策的特例。从那以后,任何国家、地区来华的难民都不会得到中国政府的安置,也不能长期留下来。(应采访对象要求,余明明、何启凡为化名)

(据《凤凰周刊》)